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 邓颖超

[日]西园寺一晃 著
石云艳 韩立红 孙雪梅 译
孙莲贵 审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个日本人 眼中的邓颖超

[日]西园寺一晃 著

石云艳

韩立红 译

孙雪梅

孙莲贵 审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邓颖超/ (日) 西园寺一
晃著; 石云艳, 韩立红, 孙雪梅译; 孙莲贵审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8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

ISBN 978-7-201-06161-0

I. ①一… II. ①西…②石…③韩…④
孙…⑤孙 III. ①邓颖超 (1904-1992) -生平事
迹 IV. ①K89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871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字数: 8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中文版序言

林丽韞

西园寺一晃先生的父亲西园寺公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誉为“民间大使”，中国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西公”。1957年冬天，我曾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第二次访日，其间，西公和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在富士山下的风景名胜沼津市为我们举行了迎新年晚宴，充满友谊的欢聚至今令人难忘。第二年，西公一家就来到北京，一住就是十三年。当年西园寺一晃称邓大姐为“邓妈妈”。他进北京二十五中学习，是邓大姐专门给校长打电话联系的。周总理对他说“在学校习惯不习惯？在北京生活最重要的是要多交中国朋友”。西园寺一晃先生说：“周总理夫妇是我们一家难以忘怀的恩人。”1979年我调到全国妇联任专职副主席以后，就在邓大姐的领导下工作。作为妇女工作的新兵，在大姐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渐关心妇女姐妹的疾苦，决心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81年，邓大姐作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倡议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经选举我连任三届会长。在妇女工作和对台工作中，我经常聆听邓大姐的教诲，是大姐手把手教会我做群众工作的，这就是要建立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西园寺一晃先生在与邓大姐多次接触后萌生了写《邓颖超传》的想法，以向日本读者特别是日本的女性介绍邓颖超。这本

书在 1999 年出版后反响很好，第一版在两周内就销售一空，到 2004 年已出版了六版。邓大姐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版《邓颖超传》的日本潮出版社在封面写道：“被十亿男女老少仰慕为妈妈和大姐的邓颖超——‘周邓樱’凝聚了她的伟大一生。”邓大姐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目 录

前言 伟大的一步/1

周樱盛开 初访日本/1

周恩来病重期间与池田大作会谈/3

周恩来与创价学会/7

妻子和同志——邓颖超/11

第一章 成长历程/15

母亲的力量/15

奇迹发生/18

第二章 与周恩来邂逅/25

十五岁的革命家/25

颇具感染力的女子演讲团团长/30

如兄似妹/34

二十四床棉被战/38

附有刺绣的手织毛衣/45

第三章 理想与勇气/51

来自巴黎的一百封信/51

两个人的婚礼/58

痛失爱子/64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
邓颖超



九死一生/67

第四章 人民的支持/74

叛变者的下场/74

干部率先劳动/79

竭尽全力/84

第五章 挑战极限的胜利——长征/91

让出担架/91

不屈不挠就是胜利/97

不屈精神的结晶/100

第六章 革命根据地/106

母亲的被捕/106

民众运动/110

把战争孤儿培养成未来的人才/115

人民改变社会/120

第七章 革命伴侣/125

母亲之死/125

恋爱,是为了理想的婚姻/130

育儿、革命两不误/136

第八章 女性是开拓新时代的关键/141

蕴含着无穷力量的妇女组织/141

恪尽职守/146

互相帮助的“革命家庭”/151



第九章 再次出发之日/159

褪了色的棉布人民装/159

寄到日内瓦的海棠干花/164

健康的身体与坚定的信念/168

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171

第十章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76

诚实、谦虚、勤奋、奉献的一生/176

继承恩来遗志、踏上外交征途/180

人退心不退/185

后 记/189

译者后记/193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
董颖超



前言 伟大的一步

周樱盛开 初访日本

1979年4月19日。

中国民航专机静静地从雾雨弥漫着的伊丹机场起飞了。邓颖超的脸颊靠近窗口，透过乳白色的云层凝视着日本美丽的山河。

转眼间十一天过去了，邓颖超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再次访日。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代表，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极大尊敬和广泛欢迎。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天，周恩来曾看过、走过的地方和景物，在颖超的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在日本，颖超感觉仿佛置身于樱花烂漫之中，心中充满了温暖、甜蜜和幸福。周恩来也是特别喜欢樱花的。

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有很多很多难以忘怀的场面。

其中在京都岚山举行的周恩来纪念碑揭幕仪式令邓颖超终生难忘！碑上所刻“雨中岚山——日本京都”，是十九岁的周恩来在1919年4月下写的咏京都岚山的诗。



当时的中国正饱受外国列强的蹂躏，祖国面临着生死存亡。周恩来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习，为了投身革命抵抗运动，他毅然决然地回国。这首诗颖超一定读过许多遍。每一次读都会令人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看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诗表达了青年周恩来救国救民的强烈感情。如今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在岚山的龟山公园里竖立起周恩来纪念碑，并刻着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亲笔写下的“周恩来纪念碑”几个大字。昔日周恩来为和日本侵略者斗争而离开日本，如今这首诗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却被刻在纪念碑上，真是令人感慨万端！

飞机在云海中飞行，日本已从视野中消失。

这次访日，由于日程安排很紧，未能去看“周樱”。对于邓颖超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周恩来病重期间与池田大作会谈

周樱——

这是种植在位于东京八王子的创价大学校园内一棵樱花树的树名。就在这棵普通的樱花树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创价学会会长（现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周恩来所住医院进行了会面。为纪念这次会面，由创价大学日中两国学生在创价大学校园里种植了一棵樱花树，被命名为“周樱”。

那年，对周恩来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虽然有些前兆，但正式被诊断出膀胱癌是在1972年5月以后。不停的血尿，有时还有大量出血。周恩来拒绝进行精密检查，因为当时国内形势不允许他休息。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在党内还有影响，随后“四人帮”对老同志进行迫害并伺机对周恩来伸出魔掌。

虽然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如果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就很难建立起牢固的中日友好关系。但是，在日本国内，自民党内的形势多变而复杂，需要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政策。周恩来打算不惜一切为实现真正的对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认为错过了这个机会将来必定会后悔。如果不能马上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是两国人民的不幸，对亚洲的和平与安定也是非常不利的。





周恩来完全没有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放在心上。他想的只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了国际环境的和平与安定，为了推进尼克松访问中国带来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和邦交正常化使日中关系得以改善，一定要实现中美建交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因为工作，总理一再缩短了本来就很少的睡眠时间。癌细胞的生长是非常快的，从膀胱转移到大肠、小肠、十二指肠、胃、肝脏只是个时间问题。

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按照“组织决定”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颖超非常感谢组织的决定，总算松了口气。虽然这只是为使病情恶化得慢一些，但这已经足够使大家高兴了。因为哪怕是多活一天，不！哪怕是一秒也好。

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76年1月逝世，总理总共做了十次大的手术和八次小的手术，并使用了大量有着毒副作用的抗癌药物。

病魔消耗着总理的体力和精力，但总理以他那顽强的精神和意志与病魔进行着抗争，对于突然袭来的疼痛决不屈服。每当手术后从麻醉中醒来，他即刻就开始投入工作。其实，住院只不过是把工作的场所移到病房而已。医疗组和秘书组不知多少次地恳求总理休息，但他总是微笑着说“没关系的”，然后不停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一个人听到过总理的叫苦声。这是他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总理的秘书有着这样一份记录：从住院前的 1974 年 1 月到 5 月，总理工作了一百三十九天，其中，有九天是一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七十四天是一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三十八天是工作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五天是工作二十四小时，只有十三天是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内。

那段时间，亲友和同志们希望邓颖超劝劝总理。他们说“能说服总理的只有您了”。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大家都担心地彻夜不眠。颖超不忍心看他们这样，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他们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颖超对于大家对总理发自内心的关心感到欣慰。颖超想：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总理的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如果我是恩来的话，我也一定会和他一样的。近旁的人们恳求颖超劝周总理：“至少请现在先不要接待外宾了。”

“谢谢大家！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有的事情是即使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必须要做的事情。有的人是即使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必须会见的人。我理解恩来，相信恩来，并且支持恩来。”

不能阻止，也不应该阻止……这在某种意义上对颖超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973 年大量出血后还没过二十天，周总理先是会见了自民党的众议院议员木村武雄，然后又同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就日中进一步发展进行对话。1974 年 1 月和





大平正芳就航空协定进行会谈，3月末病情更加恶化。4月份一边输着血，一边还会见了前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

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的12月，总理以其惊人的毅力会见了池田大作会长。那是池田会长第二次访华。之前，作为周恩来的代理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和池田大作进行了会谈。

作为总理的专门医疗小组和秘书组成员，他们非常清楚无论是多么重要的贵宾，总理的病情都是不允许的。总理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在自己有生之年必须要见的人之一，这真是一次削减性命的重要会见。

当时周恩来总理七十六岁，池田会长四十六岁。

这天在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发生了“混乱”。

8月份的大手术以后，总理病情稍微平稳些，但之后病情又开始恶化。当时无论是谁都非常清楚如果强行会见的话，必定会缩短生命。因此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因为中国和人民都需要总理，都希望总理哪怕是多活几天也好。但是，周总理此意已决。

能够阻止总理的只有颖超。大家都期待着颖超，认为她一定能让总理重新考虑。但是，这一次，颖超没有阻止总理。

因为颖超非常清楚总理要会见池田的原因，并且对总理非常地理解。颖超在追溯着这段往事。

周恩来与创价学会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周总理开始关注日本。第一是 1960 年 1 月日美两国签订了《新安保条约》。日本政府继续选择了积极支持“封锁中国的政策”。第二是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反对日本政府的做法，开展了空前高涨的反对安保的国民运动。第三是日中民间交流逐渐成为一大潮流。这期间总理想方设法试图改善日中关系。

此时，高碕达之助来访。高碕是自民党众议院的议员，曾任经济企画厅长官，是经济方面的专家，热衷于改善日中关系。1955 年他作为外相代理出席了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而周恩来总理则代表中国出席了会议。当时日本政府以未和中国建交为由禁止高碕与周恩来总理接触。而高碕不顾日本政府的命令，堂堂正正地和周总理会见。从那以后高碕非常尊敬周总理，而周总理也非常信赖高碕，他作为日中关系的一个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为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发展成半官半民的廖·高碕贸易协定（L. T 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会见高碕，就日中贸易进行了会谈。当会谈告一段落的时候，高碕说：“总理，今天我有一个提案。”

“在日本有一个佛教组织的创价学会，1960 年池田大作担任该学会会长后会员激增。我家就住在学会本部



的附近,根据我平时观察,会员中普通老百姓较多,他们认真、有礼貌,热心和平问题。在日中民间交流、国家关系改善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应该和这些人交流。”

周总理认真听着高碕的热心说明。

“创价学会”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周总理指示去日本的部下们研究“创价学会”。如 20 世纪 60 年代,担任 L. T 贸易日本事务所首席代表孙平化(后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临时回国,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周总理对孙平化及其部下说:

“你们对于‘创价学会’应该重视。从会员的数量来说,它占据了日本人的十分之一,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不可忽视。应该想方设法在创价学会中多交朋友。”

同时,还指示将要访问日本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到日本后如果有机会要和创价学会建立关系。”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能够真正理解总理想法的人很少。就是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日本通孙平化也说:“坦率地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创价学会,在当时我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在池田先生访问中国之前,我们对创价学会的认识不够充分,甚至存在很多误会。”

其他干部更是可想而知。有不少人将其与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相联系,对这个有着高度组织的巨大集





团抱有一种警戒心。

有一件事情证实了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

1968年9月8日，在第十一届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上，池田大作会长直接提到了中国问题。

但这一年对颖超和总理来说都是如同噩梦般的一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此时出现了难以收拾的大混乱局面。到处发生武斗，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同志、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被红卫兵、造反派镇压。极“左”思潮盲目排外，周总理等通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的外交关系也多数遭到破坏。在日中关系上，因为中国的混乱，给反对中国派以借口。更严重的是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日中友好呼声顿时哑然。在回顾当时情况的时候，邓颖超说是池田会长的发言挽救了日中友好关系。

的确，当时池田会长的发言令人难忘。在两万多学生面前，池田坚定地说：

“我在这里想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就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讲，我们也是不能回避中国问题的。出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理念，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必须面对的首要的问题。……诸位，当你们成为社会的中坚的时候，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你们应该手拉手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只有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亚洲所有的民众互相帮助，互相保护，才能摆脱笼罩在今日亚洲的残